

略談中國現當代作家抒寫女性的缺失

——兼評《中國女性の20世紀

——近現代家父長制研究》

張元卿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2001年9月18日的《中國青年報》有這樣一篇文章——《女作家暢談女性文學：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叛逆》，文中寫道：當下少數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行為叛逆而思想陳舊，精神的反叛少了，肉體的反叛多了，所向往的，都有一種強烈的物欲色彩。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條媚俗的路線，這樣的叛逆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說明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盡如人意，簡單地說對於如何抒寫女性，抒寫到什麼程度，“我們”到底應該接受什麼樣的抒寫等一系列問題都沒有令人滿意的回答。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許多作家並不屑於深究這些問題。其實，這些問題不是當下遇到的新問題，它一直沒有消失，而要面對這一問題，需要先回頭看看20世紀文學歷程中我們的作家是如何來抒寫女性的。日本學者白水紀子的《中國女性の20世紀——近現代家父長制研究》^[1]為我們的回望提供了家父長制這樣一個角度，借助這一角度重新檢視中國現當代作家抒寫女性的歷史鏡像，我發現在“鏡子”內外的來龍去脈中湧動著的缺失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叛逆抒寫中，所以我決定從談缺失出發去接近這些問題。

《中國女性の20世紀——近現代家父長制研究》一書著重探討了在家父長制下母親的權力、母親神話的解體和寡婦的守節和再婚的問題，其中心話語是由於家父長制的存在，母親不再是母親，傳統意義上的良母已經轉變為家父長制度的代言人或化身，母親是“陽具型女人”。這種情形在現當代作品中的抒寫被概括為“殺母”的故事，《女兵自傳》、袁昌英《孔雀東南飛》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他作家諸如郁達夫、廬隱、馮沅君等作家都有這樣的抒寫傾向。這種抒寫的形成是五四反傳統、反封建的社會思潮在文學上的具體影響。現代作家，特別是女性作家都是在這樣的社會思潮啓蒙下走上社會批評的道路的。“殺母”的話題正好同那時代話題合拍，所以自然風行，就如今日消費主義與身體寫作合轍押韻一樣。白水紀子看到“殺母”的同時，也看到那些“殺母”的作家“殺”得不徹底，猶猶豫豫，比如郁達夫、廬隱、馮沅君、張聞天、蕭紅等人，但她沒有探究為什麼他們（她們）會是這樣。

李玲在《直面封建父權、夫權時的勇敢和怯懼——馮沅君小說論》中對這一現象作了解釋：“我”也沒有對母親的父權立場進行冷靜的批判。一旦涉及“我們”與母親的差別，主人公乃至作者馮沅君，實際上都不再把兩種分別代表父權專制和個體生命自由的不同道德立場置於新舊對立的歷史進程中進行善惡對照。……這個“我”並沒有把維護生命自由意志的使命推廣而放在母親肩上，沒有要求母親跟“我”一起接受新道德，“我”對母親的不覺悟不僅沒有批判，甚至也沒有居高臨

下的悲憫，只有因感恩而產生的精神仰視，因而“我”在不放棄自由戀愛信念的同時，又理解母親對舊道德的自覺維護，又設身處地體諒母親由不覺悟帶來的精神負擔和社會負擔，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認同母親觀念中群體大於個體的家族觀念，根本無視這種家族觀念與自己的個性主義信念是多麼格格不入，因而放棄了何者更為道德的深層詰問。”^[2]簡單而言，馮沅君們在看待母親時雖受個人情感的影響，但從理性的層面看，她們（他們）既看到了母親有家父長制化身的一面，又深深感到母親的母性光輝並未曾被這種制度完全吞噬，愛恨交織是她們（他們）這些作家抒寫母親時共同的精神處境。對於有“陽具型女人”精神特徵的母親所展現的母性，在白水紀子的書中並沒有加以討論，而這正是中國女性在家父長制度下拒絕異化、自我妖魔化，保持人性中正常的母性的抗爭。這種抗爭往往被表面的保守所遮蓋，因而長期被作家和批評家忽視。於是“殺母”故事慣性地在 20 世紀寫作中延續，直到今天在抒寫母親時或渲染“星媽”望子成龍而無情地對子女的未來實施強力的專制，或繼續描寫妖魔化的母親，或直接宣洩對母性的厭惡而普遍忽視對母性的稱頌。在這一點上當代作家延續了五四反傳統寫作的傳統。從五四到今天，我們的作家重視的是女性作為祖母、婆婆、妻子、妾、情人、妓女、欲女的社會身份，樂此不疲地抒寫的是這些內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從《廢都》對情人的性欲化把玩到如今“上海：情欲在尖叫”，五四時的社會批評在當下已轉化為文本的欲望消費。我們的閱讀視野中瀰漫著“玩”和“殺”，母親的身份不是不被關注的，母性基本上是缺席的，這是現當代作家抒寫女性中的嚴重缺失。

對於這種缺失，現代作家有及時的修復，這從馮沅君小說的主題變化中可以看出，正如李玲所歸納的：“如果說《隔絕》、《隔絕之後》，是以愛情抗爭為第一主題，母愛抒寫為第二主題的話；那麼《慈母》、《寫於母親走後》，母愛抒寫則昇為第一主題，愛情抗爭則退為第二主題。《誤點》是兩個主題相互糾纏，雙頭並重。”^[3]此外，畢倚虹《北裏嬰兒》、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劉雲若《舊巷斜陽》等小說都有對母性的抒寫。但整體而言，母性雖是抒寫女性的基本主題但並未成為重要主題，在今天這個主題在身體寫作的亂流下已被許多作家自動放棄，因為母性不能“尖叫”，沒有看點，缺乏競爭力。和現代作家相比，當代作家缺乏及時修復的自省能力，所以不能從根本上回答為什麼要抒寫女性，可以怎樣抒寫？

相對於漢族作家對母性的放棄，朝鮮族作家卻看重超越異性愛的母愛的價值。李花淑《她也是女人》、李英錦《在海邊遇見的女人》、李善姬《媽媽，你在哪兒？》等作品卻自覺歌頌母性，強調母愛。可是她們的作品在當代主流語境中並未受到什麼關注。這讓人感到所謂的主流語境其實是話語黑洞。母性的聲音就是在這種語境下被銷聲的。

當代母性抒寫的缺失除了文學觀念和主流語境等內部因素外，和全球化時代的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當代日本女性文學中反“母性”的問題就是這種全球化影響的折射。他們（她們）認為女人是“張開兩條大腿生產出碩大的土豆”的物件，是女性的羈絆。

在現代社會長久的封建思想殘餘壓抑下，女性文學具有強烈的甚至極端的反叛精神，這無可非議，可是徹底否定母性就能拯救我們的心靈嗎？

這種否定母性的文學思潮，其實源於母親神話的解體這一精神事件。這也就是娜拉走後會如何的老話題。身體寫作，非母性寫作無疑是以反叛甚至墮落來進行精神的出走。這是因為封建社會倫理（包括家父長制）崩潰後，其殘餘結構並未從人們的深層意識中徹底瓦解，可是新的國民倫理又未培育成熟，人們無可適從，而欲望依舊，不能回去，又不知路在何方，於是只好“跟著感覺走”。那麼抒寫女性能否從對待母性問題開始有新的前路呢？而今，精神啟蒙如果在制度落實的層面有所作為，那麼重建倫理就不是空話，對母性的倫理位置就會有合理的認知，關鍵是我們如何進行新的啟蒙，如何進行精神重建，如何使理想社會的好處在每個國民身上得到體現。因此談論抒寫女

性，談論母性的缺失，從家父長制研究入手，容易看清女性在現實和文學中的境遇，但單一的制度攻察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還需探究制度背後的思想及其變化，特別是被遮蔽的母性光輝是靠什麼力量穿透千年的迷障通照古今的。曹七巧母性光輝的黯淡就宜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加以討論，加以批評。這樣的思考顯然不是以賣點為觀點，以世樂為樂的作家所願意面對的。

五四以來批儒之風一直延續，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現當代作家在抒寫女性時也受到這種思想感染，突出的表現是把女性的不幸簡單地都歸咎於儒家，歸罪於禮教，很少做具體深入的追究。一些批評家也多從批儒的觀點來立論。這表明在女性抒寫和批評中長期存在著認知的缺失，即習慣運用單一的批儒手法，而缺乏客觀的理性精神。白水紀子從家父長制對女性的影響的角度來研究現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問題，把解讀建立在具體分析文本語境及相關歷史語境的基礎上，因而避免了一般研究者常有的簡單空泛。從家父長制的角度去研究女性抒寫確實可以看清長久以來造成女性不幸遭際的原因，也容易為人理解和接受，但把原因主要歸結於制度，放棄對制度背後的思想的探究，也只是比簡單批儒前進了一步。

同是批儒，現代作家和當代作家在抒寫女性時卻很不相同。沈從文在《巧秀和冬生》中寫族長是通過他一手製造的沈潭事件來刻畫，是靠形象和事件說話，不故意追求什麼文化氣息，不刻意營造沈重的氣氛，不機械地把人物的命運和禮教做簡單聯接。而同是寫對寡婦的摧殘，尤鳳偉的《泱泱水》則直接引入“婦道”、“《趙氏祠譜》”及大段的《論語》，由此來構築儒家禮教的氛圍，潛意識中已把儒家放到了被告席上。可是把家父長制的罪惡簡單地歸因於儒家禮教並不符合歷史實際。作為家父長制化身的“族長”其實是儒表法裏，或說陽儒陰法，其身上至少還有法家的影響，“沈潭”事件恰好表現出法家的冷酷無情。而要談清楚家父長制的形成及其對女性的影響，須從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著眼，不能只從近代的情形簡單立論。就如“沈潭”事件，它是典型事件，對它的解讀要放到具體歷史情景中攻察，不宜把這種典型事件隨便解讀為當時社會的通病，簡單把病因加在禮教頭上。家父長制在不同地域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情形，具體的“沈潭”事件宜從具體情形出發去討論。可是現當代作家對類似事件的典型化處理，以及文中潛含的對儒家禮教的責難，卻極易把讀者的思攷導向單純的對儒家的批判。我這樣說並不是替儒家開脫，而是反對輕率地批判儒家，思攷止於批判儒家的抒寫傾向。

比如《中國女性の20世紀——近現代家父長制研究》論及的寡婦再嫁的問題，如果不從千年歷史著眼，就會覺得寡婦的處境歷來如此，就是家父長制在作祟。可是據吳景超的研究，漢代寡婦再嫁不受約束，也不失體面。論及陳平娶妻的故事，他指出：“這個故事，有好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嫁過五次的女子，不厭再嫁。第二，寡婦的尊長，不但不勸寡婦守節，還時時刻刻在那兒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過幾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歡她，要娶她。第四，寡婦的父親，並不以女兒為寡婦，而降低其擇婚的標準”。^[4]直到宋代，至少到宋代的時候，寡婦改嫁還是很平常的。但是到了明清，特別是到了清代，才被認為是非常可恥的，而且丈夫死了以後就只能守節。而從漢到清，儒家思想一直存在，為何前後的作用會如此不同？作為女性抒寫者對此自然不必有十分具體的回答，但這樣的思考，特別是這樣的眼光卻不可或缺。

文學界在女性抒寫上的認知缺失以及長期把儒家作為女性痛苦之源來對待，也凸現了思想界和文學界的隔閡。無疑這種隔閡助長了認知的缺失。女性抒寫的活力之源在於思想的魅力，若思想存在認知缺失，作品的陳義就低，陳義低，則格調卑，格調卑，則無足觀。

一九三四年冬天，沈從文從北平回湘西，看到家鄉鳳凰什麼都不同了，雖有了極大進步，卻掩不住墮落的趨勢，而原有的正直素樸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之而流行的是假“現代”之名而行惟利是圖之實的庸俗人生觀，於是他寫了《邊城》。他寫《邊城》，寫邊城的女性，其命意是在思攷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有這樣的認知，精美的文章才有魂，而現當代女性抒寫缺的就是這魂。

註釋：

- [1]白水紀子：《中國女性の20世紀——近現代家父長制研究》，明石書店，2001年。
- [2]李玲：《直面封建父權、夫權時的勇敢和怯懼——馮沅君小說論》，《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 [3]李玲：《直面封建父權、夫權時的勇敢和怯懼——馮沅君小說論》，《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 [4]吳景超：《西漢寡婦再嫁之俗》，《清華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